

明代的經筵日講

—— 宋秉仁 ——

壹、前言

貳、定制前之講讀

參、講筵體制之確立

肆、明代講筵特色

伍、神宗朝之講筵

陸、結論

壹、前言

經筵日講，簡言之，即古代廷臣入宮為皇帝或太子講讀經史，使學習治國政術。為一特設之御前講席。一般所指，經筵為定期舉行之禮，有規定儀節，其行儀或每旬、或每月、或兼旬一舉，各代不同。日講則為密集式講讀，或每日、或每隔數日一舉，儀節清簡，為帝王研學之主要來源。本文所論為明代諸帝之講讀，太子教育以其另具典制，不在探究之列。

漢代已有御前講讀之事。昭帝幼年即位，輔臣選碩學名儒韋賢等入授於帝前，宣帝曾命諸儒於石渠閣講五經。唐代，玄宗置集賢院日講經史。宋代，真宗朝有崇政殿說書之制，始稱經筵（以講畢賜酒飯筵席之

故)(註 1)，置講官，以翰林學士等官充或兼，每年二月至端午，八月至冬至為講期，講官逢單日入侍，輪流講讀。元、明、清均有承襲，其詳情則互有異同。然經筵之真正定制，著為儀注，則在明代中葉之初。

講筵之制，有其特殊意義。既在儒家理想之實現，亦為講究治術之所需。以明代為研究目標，即以其為定制之始，正可觀察其真內涵，亦為觀察實踐儒家政治理想之最佳場所。明代講筵之定制與實行，有時空之流轉變遷，有人物之體會用心，具是繁瑣複雜，故本文之行文不免冗長無趣。然為探明此制之深刻意義，實為不得不然耳。另又以神宗朝為例，以見講筵實情。

再進一言以為說明者。講筵之時，無論主授之講官或侍班之侍講讀等官，具是經明行修、德業兼備之儒學文臣。近世論者每慣於視古代此類人物為儒臣，殊不知儒臣為專稱，定義嚴格，與詞臣、科臣等稱作相同，專指一定出身起家、一定官稱職掌之人。若仍混淆不辨，即無以申明古代官職特徵。然以襲用既久，若強加分明辨析，必多費筆墨，於本文又無關宏旨，故並不嚴格分明對待，仍從俗視之，以免多引波瀾。或逕視之儒生官僚可也。此為重要論題，於此不論，期俟諸將來。

貳、定制前之講讀

明代講筵之制，定於英宗正統元年(一四三六)。其前朝諸帝講讀既承古代而來，亦為定制之濫觴，故先略述定制之前諸帝講讀實況。

太祖於元末征戰之時，首於元至正十八年(一三五八)十二月辟儒士

註 1 汪汲，《事物原會》。揚州，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據清嘉慶丙辰(元年)古愚山房藏板影印。卷四，頁 3，經筵：「潛確類書經筵歷代無專官。自漢宣帝甘露三年庚午始詔諸儒講五經于石渠閣。《朝野雜記》宋寧宗慶元後臺丞諫長暨副端正言司諫已上，無不預經筵者。正言兼說書自端明巫伋始，副端兼說書自端明余堯弼始，察官兼說書自少卿陳夔始。」

范祖幹、葉儀為諮議。旋詔徐元等十三人分直進講經史，敷陳治道。(註 2)廿三年(一三六三)置禮賢館於金陵，學者陶安、夏煜、劉基、章溢、宋濂、蘇伯衡等人皆在館中；太祖先後與辟徵諸儒「論經史，及咨以時事，甚見尊寵」。(註 3)又命儒士滕毅、楊訓文集古無道之君如桀、紂、秦皇、隋煬等所行非道之事以進，認為往古人君所為，其善惡皆可為龜鑑，觀諸非道之君所行事，正欲知其喪亂之由，以為之戒。(註 4)是知太祖雖出身寒微，然舉兵之際對前代興盛衰亂之因仍極端重視。據實錄所見，類此尚有數例。如命有司訪求古今書籍，藏之秘府以資閱覽；博士許存仁講尚書洪範，至休咎徵應，因而體會「君能修德，則七政順度，雨暘應期，災害不生；不能修德，則三辰失行，旱潦不時，乖異迭見，其應如響……今宜體此，下修人事，上合天道……為人臣者亦當修省以輔其君，上下交修，斯為格天之本」。(註 5)

初時太祖講讀並無定制，亦無定所，可謂純為統一政術之所需而行者。元至正廿七年(吳元年，一三六七)設博士廳，令博士許存仁等日講尚書。及定天下，乃令文學侍從之臣講說經史，仍無定期、定所。尋設華蓋、文華、武英諸殿說書官，以儒士沈德等人為之。其後又以翰林院

註 2 《明實錄》。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影印。太祖，卷六，頁 8。談遷，《國權》。北京，古籍出版社，1958，頁 282「(元順帝至正十八年十二月丙戌)辟儒士范祖幹、葉儀。祖幹持大學入。問治道何先？曰，不出此書。召儒士許元、葉瓚、胡翰、吳沈、汪仲山、李公常、金信、徐華、章冀、戴良、吳履、張起敬、孫履，皆會食省中。日令祖幹、儀進講治道文史，授諮議，皆辭。」另參見《明史》，北京，中華書局，1974。卷一三七，列傳二五，吳沈，頁 3947；卷一七〇，儒林一，范祖幹，頁 7223。

註 3 《明實錄》，太祖，卷一二，頁 4。

註 4 《明實錄》，太祖，卷一七，頁 34，時在元至正廿五年(一三六五)六月。

註 5 分見《明實錄》，太祖，卷二〇，頁 7；卷二一，頁 2。分別為元至正廿六年(一三六六)五月及八月。

官及殿閣大學士專其事，而罷諸殿說書官。(註 6)洪武十三年(一三八〇)晉王府左長史桂彥良朝京師，上太平治要十二策，此為明代首次以開經筵事疏請者，頗為重要。其疏云：

……六曰開經筵。自昔聖主賢臣，治天下之大經大法，具載六經，不可不講也。講之則理明而心正，措之政事，無不得其當。宜擇老成名儒，於朔望視朝之際，進講經書一篇，敷陳大義。使上下聳聽，人人警省，興起善心，深有補於治化也。(註 7)

其用意不僅在君主之講學，亦藉此為臣僚百姓之楷模，以有補於治道。於此已窺見講筵政治意涵之一端。此疏未為太祖所納，其後講讀仍不定期，其時間、內容仍由太祖自行決定。

惠帝初即位，召方孝儒為翰林侍講，尋遷侍講學士。惠帝性好讀書，以董倫與孝儒同侍講讀，每有疑即召使講解。靖難役畢，成祖簡編修楊士奇入內閣典機務，並侍講讀。同時侍講者尚有同直文淵閣之金幼孜、解縉。永樂二年(一四〇四)，楊士奇、解縉等屢進大學講義，帝覽之至再，且數稱善。(註 8)永樂十二年(一四一四)親征瓦剌之際，復命楊榮、胡廣、金幼孜於軍中乘間陳說經史。(註 9)

仁宗在位僅及一載，亦講讀不輟。時成祖喪滿二十七日，帝孝服臨

註 6 徐學聚，《國朝典彙》，台北，台灣學生書局據明刊本影印，民國 54 年，卷二五，頁 1。

註 7 清高宗敕選，《明臣奏議》，上海，商務印書館叢書集成初編本，民國 25 年。卷一，頁 9。又見徐孚遠、陳子龍、宋徵璧等編，《皇明經世文編》，台北，國聯圖書出版有限公司據崇禎間平露堂刊本影印，冊三，頁 189-190。

註 8 《明實錄》，太宗，卷三三，頁 7，永樂二年八月己丑。徐學聚，《國朝典彙》，卷二五，頁 4，永樂二年六月。

註 9 《明史》，卷一四八，列傳三六，楊榮；北京，中華書局本，頁 4-39。卷一四七，列傳三五，頁 4125。

朝，而群臣皆已釋服，獨武將張輔與學士楊士奇服孝如初，帝嘆曰「輔，武臣也，而知禮過六卿」，(註 10)乃命知經筵事，兼修實錄。此並非經筵定制，乃以張輔兼知講讀事宜，總揆諸事而已。又建弘文閣，妙選諸臣有學行者侍值。楊士奇且薦侍講王進、儒士陳繼；蹇義薦學錄楊敬、訓導何澄等日值閣中。並命翰林學士楊溥掌閣事，帝親授閣印曰「朕用卿左右，非止學問。欲廣知民事，為治道輔。有所建白，封識以進」。(註 11)此知仁宗實有意求治，只可惜天不假年耳。

宣宗曾諭新授之南京國子監司業陳敬宗云「侍講，清華之選；司業，師儒之席。位雖不崇，任則重矣」。(註 12)是知講官地位甚高，但其本官職位則較卑下。此亦有深意，蓋位卑望重，則講讀時無所瞻顧，得盡心暢言，學問、問學均在乎此。宣德二年(一四二七)三月，帝御文華殿聽講孟子離婁篇，問翰林講官「伯夷太公皆處海濱而歸文王；乃武王伐紂，太公佐之，伯夷扣馬而諫，所見何以不同」。講官答以「太公以救民為心，伯夷以君臣之義為重」，帝因演其義「太公之心在當時，伯夷之心在萬世，無非為天下生民計也」。三年(一四二八)二月進講舜典，帝曰「觀二典、三謨，則知萬世君臣為治之道，不出乎此。曆象日月星辰以閏月定四時，天道以明治水土，奠高山大川，分別九州，任土作貢，地道以成，克明峻德以至協和萬邦。人道以建，九官十二牧，所掌禮樂刑政及養民之道。後世建官繁簡雖不同，大要不出乎此」。六年(一四三一)三月視朝退御便殿，命講大學平天下章，曰「治天下國家不在無財用。即如生之者眾，四語(按，指修齊治平四事)行之，不必暴征橫斂而國用有餘矣」。九年(一四三四)十一月聽講周書畢，因論周基業之成曰「當時皆以為周之不造，及成王定奄平淮，東土

註 10 《明史》，卷一五四，列傳四二，張輔；頁 4223。

註 11 《明史》，卷一四八，列傳三六，楊溥；頁 443。

註 12 《明史》，卷一六三，列傳五一，陳敬宗；頁 4424，時為宣德二年(一四二七)。

始寧，罪人斯得，而天又大雷電以風，用彰周公之德；成王迎公，歸誅管蔡，遷殷頑民，而後王室安，……則知始之所震撼者，正天所以維持鞏固之也」。(註 13)講讀內容皆是治平之道，實可見講筵之制其內涵在於聖君賢主之訓練。雖然證之歷史，並不能完全肯定講筵功能，而歷代君主之態度亦多有差別；唯此制於儒家政治之傳統理想而言，卻是歷代臣工不斷向君主提出督促勸勉之良法。

參、講筵體制之確立

英宗繼宣宗之後登寶，時年九齡。閣臣楊士奇、楊溥、楊榮以聖學未及緝熙，疏請早開經筵。其疏略云：

伏惟皇上肇登寶位，上以繼承列聖，下以統御萬邦，必明堯舜禹湯文武之道，以興唐虞三代之治，則宗社永安，皇圖永固，天下蒙福，永遠太平，然其根本在致力於聖學。自古聖賢之君，未有不學而能致治者也……伏望山陵畢日，早開經筵，以進聖學……。

一、自古人君成德必先於學，未有不學而能成德者……經筵侍講之官，實為學之資，今皇上進學養德，當預擇講官，必得問學貫通，言行端正，老成厚重，識達大體者數人以共其職……乞預命吏部禮部翰林院公同推舉，具名陳奏，取自上裁。如或其人學術不正，立心行己素無善譽者，不得濫預。蓋師友之臣，即他日輔導之臣，不可不謹擇。

一、天子就學，其事體與皇太子親王不同，乞先命禮部翰林院詳定講筵禮儀陳奏……。

註 13 徐學聚，國朝典彙，卷二五，頁 5-7。

疏入允行，著為常儀，以月逢二日御文華殿進講，儀節甚繁，每月三次，是為月講，又名會講，即經筵或大經筵，寒暑暫免。日講則行於文華穿殿，行儀較簡，又名小經筵或小講。復定經筵講讀及贊禮各官，用昭講儀之隆重。（註 14）

詳引三楊此疏，意在其中實有數層深刻涵義：一、講筵之目的為使君主以學得道，以道致治。其道則遠溯上古賢聖，亦寓政治正統之意。二、幼帝即位，如不早行講讀，任使長於宮中宦侍之手、徇於母后女官之懷，除非自能警醒，否則恐將來荒殆廢政，不僅無以修業，亦啟天下罹禍之漸。三、講官由部院公推，定必須經明行修，德業超邁，地位之崇隆可知。講官與君主為師友，又極可能為後日輔弼股肱，故須謹慎選任，以免導帝於歧途。此實為儒家政治理想之體現，聖君賢臣相輔而成至治，而聖君之成仍須通達老成之臣時刻規勉；尤其幼帝即位，正為陶鑄君德之良機。四、為昭隆重，特定講筵儀注，選官主事，定為禮之一種，（註 15）由禮部及翰林院共商詳定儀節，更可證儒家以禮為政之政

註 14 楊士奇，「請開經筵疏」，見《皇明經世文編》，冊三，頁 415-419。又見《明史》，卷一四八，列傳三六，楊溥；頁 4134。及廖道南，《殿閣詞林記》，欽定四庫全書本，史部七，傳記類三（總錄之屬），台北，商務印書館影印，卷一五，頁 1-2。清，張英、王士禎等纂，《淵鑒類函》；北京，中國書店據清康熙四十九年序本影印，1985；卷七十，設官部，經筵總裁四，頁 2，小經筵。

註 15 龍文彬纂，《明會要》，北京，中華書局，1956。卷十四即將「經筵日講」置於「禮」第九，屬五禮中之嘉禮，見頁 221。朱國禎，《湧幢小品》記明代經筵各官選用之例：「凡經筵，例用勳臣一人知經筵事，內閣或知或同知經筵事。九卿之長及學士祭酒等官侍官，詹翰坊局及國子祭酒每二員為講官。詹事府詹事等官，各部侍郎出由翰林者，仍為講官。翰林春坊每三員為展書官。給事中、御史各二員侍儀。鴻臚寺錦衣衛堂上官各一員供事。鳴贊一員贊禮。序班四員舉案。侯伯一人領將軍入直。制敕房官書寫講章。通謂之經筵官，皆得入銜。每當鳴鞭退朝，上將赴經筵，則各從本班略整衣冠，以俟先出分隊作一字行，隨駕而南」。見台北，新興書局筆記小說大觀本，卷二，頁 2，經筵詞第三首。

治理想於此得以發揮。五、月講儀節繁複，講官宣讀講章，並不細為演繹，經筵過程一切細節，皆由贊禮官引導進行。此具象徵意義，用示君主好學，以為天下模範。日講則為君主真正講學之機，師友相互問難，反覆申說，使君主得從中獲致真學問，而講官亦得乘間陳說國事，規諫君德。故經筵月講，無論於政治實際與君主個人之進德修業，均不如日講重要。以下簡述英宗定制之經筵概況，及沿革情形。

正統元年(一四三六)二月定制，原以三楊之請，至是命太師張輔會閣臣推舉講讀各官。其制：

知經筵事：太師英國公張輔

同知經筵事：少傅兵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楊士奇

少傅工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楊榮

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楊溥

經筵官：少詹事兼侍讀學士王直

少詹事兼侍講學士王英

侍讀學士李時勉、錢習禮

侍講學士陳循

侍讀苗衷

侍講高穀

修撰馬愉、曹鼎

侍講：翰林春坊等衙門儒臣

侍班：太子太保成國公朱勇

少保兼工部尚書吳中

吏部尚書郭璉

禮部尚書胡濙

兵部尚書王驥

刑部尚書魏源

都察院右都御史顧佐

另有講官、展書官、侍儀、供事、贊禮、舉案、侍衛各官，均為兼領。

講讀內容為經、書。經是尚書，書是大學。並有講官擬就之講義供帝瀏覽。每月初二、十二、二十二舉行，為免凍熱之苦，故值寒暑則暫免。此即(大)經筵月講，又名會講。由內官先一日於文華殿陳設各物，御案、講案各一，均置該講經、書。御案並置講義。翌日奉天門早朝畢，退文華殿行經筵儀。其儀繁複冗長，不述。唯須注意者，講官依講義奏講某書，講畢則退，帝不需問難，講官亦免申論。禮畢，賜各官於左順門進酒飯，帝逕還宮。

日講則每日止用講讀官或四或六，學士輪流侍班，不用侍衛、侍儀、執事等官。講讀時儀節甚簡，不用講義，止御案置經、書，講官則指書口講。先讀書，次讀經、史。每伴讀數過，講官直說大義，惟在明白易曉。可問難，亦可申覆。讀後有侍書官侍帝習字，畢，各官退於文華殿賜茶，文華門賜酒。(註 16)

英宗首開經筵在正統元年三月乙亥。世宗嘉靖六年(一五二七)定月之三、八日，由經筵日講官二員進講大學衍義。十年(一五三一)又定無

註 16 正統初定經筵日講儀注及官制，分見《明實錄》，英宗，卷一四，頁 9，正統元年二月丙辰。李東陽等撰，申時行等重修，《大明會典》，台北，東南書報社據萬曆十五年司禮監刊本影印，卷五二，禮部一〇，頁 1-5，經筵。黃佐，《翰林記》，上海，商務印書館叢書集成初編本，民國二十五年，頁 123-126。孫承澤，《天府廣記》，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頁 345，經筵事宜。廖道南，《殿閣詞林記》，卷一五，頁 2-7。孫承澤，《春明夢餘錄》，香港，龍門書店據清光緒九年廣州惜分陰館南海孔氏古香齋鑒賞袖珍本影印，1965，卷九，頁 1-3。《明史》，卷五五，志三一，禮九，經筵，日講；頁 1405-1407。又朱國禎，《湧幢小品》記載講義的撰寫程序：「凡進講，先從內閣點題，票示講官，分撰講章，送閣下詳定，敕房官用高頭白手本寫成二通，講官預進東閣，用象管朱印成句讀科發，隔日進呈，其一在御座展覽，其一在講案供講」。見台北，新興書局筆記小說大觀本，卷二，頁 2，經筵詞第二首。

逸殿講儀，儀節較簡。穆宗隆慶六年(一五七二)又有午講之事，除每日早講之外，命再進午講，講通鑑節要及貞觀政要，唯遇三、六、九視朝日則免。至神宗萬曆元年(一五七三)諭爾後大小經筵，春講自二月十二日起，五月初二日免；秋講自八月十二日起，十月初二日免，永為定例，毋需題請。思宗崇禎十五年(一六四三)八月，以日講官韓四維屢次半途遺忘書文，特矜凜寬宥，諭輔臣「日講可照經筵例，亦置講章。朕有所疑，可據以問難，而講官亦不至遺忘」。遂於日講亦置講章，而講官則可用牙簽指講。(註 17)

肆、明代講筵特色

明代經筵日講儀注，隨各朝新君即位而稍有不同。英宗定制時，每年開講日期並未明訂。嗣後諸帝即位，均由禮部重訂經筵日講儀注。其儀節職官均大致相同，惟開講日則各朝互有異同。如憲宗即位，定每歲以二、八月中旬起，四、十月末句止。每月三次會講，逢二皆行日講。(註 18)

講讀內容各朝均同，四書五經通鑑為經筵主講之內容；日講則除此之外，尚有祖訓、貞觀政要、大學衍義等其它經典。要皆儒家學問。英宗正統元年三月肇開經筵，少傅楊榮進講尚書堯典克明峻德章；待復辟後，天順時，禮科給事中張寧請講大學衍義，從之。(註 19)憲宗成化三年(一四六七)，洗馬楊守陳充經筵官講尚書武成篇。成化十四年(一四七八)十二月，講中庸二十章。(註 20)孝宗弘治元年(一四八八)三

註 17 孫承澤，《天府廣記》，頁 347，經筵事宜。

註 18 尹直，《塞齋瑣綴錄》，卷一，經筵禮儀。鄧士龍輯，《國朝典故》，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點校排印本，1993，頁 1246。

註 19 徐學聚，《國朝典彙》，卷二五，頁 8-9。

註 20 徐學聚，《國朝典彙》，卷二五，頁 9。

月，早講尚書、孟子，午講大學衍義。弘治九年(一四九六)閏三月日講，諭德王華講唐李輔國與張后表裡用事。十年(一四九七)二月经筵，侍講學士王鏊講周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刺帝春遊後苑。孝宗晚益勤學，學士張元禎請增講太極圖、通書、西銘，帝亟取觀之，喜曰「天生斯人，以開朕也」，欲大用之，然未幾而帝崩。(註 21)

武宗踐祚，以居東宮時講論語、尚書各未終卷，命日講時續講；近午時則講大學衍義、歷代通鑑纂要。(註 22)世宗時，戶部尚書孫交請經筵日講須講皇明祖訓，乃命內閣圈點句讀，旁貼字義，陸續進呈。嘉靖十年(一五三一)八月西苑幽風亭落成，特御無逸殿命講尚書無逸篇與詩幽風七月。(註 23)穆宗隆慶四年(一五七〇)，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殷士儋請四時講筵無輟，并進講祖訓及大學衍義、貞觀政要，帝嘉納之。(註 24)

講官日與帝相接，以經史訓典導帝讀書。常理判斷，君主言行理應受其影響，漸成明道立政之主。故講官之任使，必格外謹慎，不可用偏邪小人，以免誤導敗政；即使學問淹博，才通棟宇，若其人心胸褊狹，目淺識短，亦不用。而講官以導帝讀書之故，久之自成君主腹心，為國政民生百務諮議之對象，日後極有可能躍升龍門，由侍講讀而成為輔弼股肱。正統時，三楊疏請肇開經筵，即言「師友之臣，即他日輔導之臣」，而講官之選「必得問學貫通，言行端正，老成重厚，識達大體」，且注意「如或其人學術不正，立心行己素無善譽者，不得濫預」。其產生的方式為「吏部、禮部、翰林院公同推舉」。此疏足以說

註 21 徐學聚，《國朝典彙》，卷二五，頁 10-12；《明史》，卷一八四，列傳七十二，張元禎；頁 4880。

註 22 《明武宗實訓》，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影印，卷一，頁 5。

註 23 徐學聚，《國朝典彙》，卷二五，頁 13、19-20。《明史》，卷一九三，列傳八一，李時；頁 5-13。

註 24 《明史》，卷一九三，列傳八一，殷士儋；頁 5-25。

明講官選任之標準、方式及其地位。明代各朝君主雖不盡均認真講讀，但依制，各部院與輔臣仍不時拔擢經明行修之儒學文臣侍講以備顧問：編修、修撰、寺卿、司業均有可能，前文已及，宣宗即曾諭道「侍講，清華之選；司業，師儒之席。位雖不崇，任則重矣」。此等儒學之臣其本職品階並不一定，實錄中隨處可見拔擢侍講讀之紀錄。孝宗弘治六年（一四九三）閏五月，太常少卿兼侍講學士李東陽亦言：

講官，官不必高，所貴實任。苟非其人，不宜濫置。既授之任，必重其官（註 25）。

憲宗成化初，編修張元禎亦有類同之語：

講官，令大臣舉剛明正大之人，不拘官職大小。（註 26）

明臣對君子小人之辨甚是激烈，甚至為此而起政爭。然對講官之選，則皆同聲籲請「得賢」，且是「真儒」（註 27），必如此方能啟沃帝心，厚養君德。講官選任之標準，大抵是經明行修、術德兼備一類，茲再舉數例：景帝景泰元年（一四五〇），大理寺右丞薛瑄言：

博選公卿侍從文學之臣，有學術純正，持己端方，謀慮深遠，才識超卓，通達古今，明練治體者一、二十人，使之更代入直。

孝宗弘治元年（一四八八）正月，楊守陳言：

若小經筵，則必擇端介博雅之儒侍班進講。

世宗嘉靖元年（一五二二），王鏊言：

註 25 余繼登，《典故紀聞》，卷一六。台北，大立出版社，無出版日期，頁 284。

註 26 《明史》，卷一八四，列傳七二，張元禎；頁 4879。

註 27 鄭一鵬，「重經筵以養聖德疏」，《皇明經世文編》，冊一四，頁 43。
《明史》，卷二八三，儒林二，賀欽；頁 7264。

妙選天下文學行藝著聞者七、八人，更番入值。

嘉靖四年(一五二五)十月，禮部給事中鄭一鵬言：

有行誼，通經術。

嘉靖五年(一五二六)，工科給事中陸粲言：

妙選博聞有道之士，更番入直，講論經史。(註 28)

講讀時，講章為講官所寫，須經內閣改定，方能據以進講。其用意
在內閣輔政，亦負厚養君德之責。講讀既為君上獲取學識之重要管道，
理宜先行閱改講章，使具「溫潤之氣，以具告君之體」，「去粗涑鄙野
之伏，以養夫親近儒臣之心」，並非徒為修美文辭。(註 29)此事曾引
起不滿，正德時，講官陸深便認為講讀之時，布義陳詞，一切忠孝仁義
廉恥禮讓諸目，講官若反求己身而一無所有，則聽者誰則信之；必勉加
修踐，而後可收感孚之效。今內閣改定講章，講官說來並不一定伏貼，
無論解經申義，均有束縛之感。此所以講章必出講官之手。然經內閣先
行閱改，則講官「不過口宣之」，「於義理深有未安，而交孚相感之道

註 28 以上分見薛瑄，上講學章，《皇明經世文編》，冊四，頁 104。楊守陳，
「講學聽政疏」。孫荀編，《皇明疏鈔》，全七〇卷，台北，台灣學生書
局據萬曆十二年兩浙都轉運鹽使司刊本影印，卷八；頁 694。王鏊，「講學
親政疏」，《明臣奏議》，卷一七；頁 293。《世宗實錄》，卷一。鄧士
龍，《國朝典故》本，頁 626。鄭一鵬，「重經筵以養聖德疏」。《明
史》，卷二〇六，列傳九四，陸粲；頁 5448。陸粲，「法祖宗復舊制以端
治本疏」，《皇明經世文編》，冊一八，頁 240。另，陸鉉，《病逸漫
記》。鄧士龍，《國朝典故本》，頁 1509 記云「正統初，選經筵官，閣下
悉以翰林院官充選。時章后在內，批云『如何不見居外賢臣』？以旨付弘
文館，於是劉球等幾人自部屬進次經筵」。

註 29 陸深，「陳愚見以禪聖學疏」。《皇明經世文編》，冊一〇，頁 676。

遠矣」。乃以此為諫。(註 30)但並無效果。

明代講讀末一特色，為除經、書、諸史以外，特重宋儒真德秀所著之大學衍義一書。太祖曾向宋濂問以帝王之學，何書重要。濂舉大學衍義，帝命大書揭於殿之兩廡壁。平日且勤覽此書，以為其書先經後史，要領分明，使人觀之容易而悟，太祖「每披閱便有儆省」，直視為有國之龜鑑。更令儒臣日與太子諸王講說此書，使「驗古鑑今，窮其得失」。(註 31)太宗時，詞臣楊士奇對此書評價甚高，其於侍讀時曾進言：

德秀是道學之儒，所以志識端正。其所著大學衍義一書，大有益學者及朝廷，為君不可不知，為臣不可不知。君臣不觀大學衍義，則其為治皆苟而已。(註 32)

宣宗時天下尚稱承平，帝好遊獵，陳祚以勸勤聖學上言此書畢載聖賢格言，請聽政之暇，命臣講說，「非有大故，無得間斷」。(註 33)憲宗時定日講課程，先大學衍義，次貞觀政要。(註 34)世宗嘉靖六年(一五二七)且特定講大學衍義儀，月逢三、八日進講，即每五日一講。此是應大學士楊一清之請而定，其言曰：

經書格言，通鑑要旨，盡在此書，而治國平天下之道，舉而措之不難矣。

註 30 同 29。

註 31 《明太祖實訓》，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影印，卷二，頁 7，洪武十七年四月庚午條。《明史》，卷一二八，列傳一六，宋濂；頁 3787。

註 32 楊士奇，《三朝聖諭錄》，中卷，鄧士龍，《國朝典故》本，頁 1082-1083。

註 33 《明史》，卷一六二，列傳五〇，陳祚；頁 4401。

註 34 尹直，《謏齋瑣綴錄》，卷一，經筵禮儀。鄧士龍，《國朝典故》本，頁 1247。

帝納其言，且進而認為宋儒真德秀著衍義以羽翼大學，其惓惓致力者，亦不過申說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之道。德秀獻於當朝，欲時君行堯舜之道，治化淳厚以奉天安民。惜時君悅而不繹，聽而不行。而今著儀進講，其理由為：

蓋其書綱舉目張，治亂興亡罔不該括。朕勉循是言，為修己治人之則，豈不大有裨哉。(註 35)

明代歷朝皆有臣工上言請講大學衍義者，實例繁多，此不具引。唯知明人之重視宋儒真氏之書，恐與其學術發展理路間接關聯。雖不必與宋明理學承襲轉變深相契合，僅作一旁說耳。此為另一論題，非關題旨，不論。

伍、神宗朝之講筵

神宗十齡即位，以張居正為首輔。居正得司禮監太監馮保之助，對神宗進行系列完整之君主教育。其講筵之行，實為明代最完整者；偶有傳免，亦因先朝諸帝忌辰，禮制所需，不得不然。惜繼張居正為首輔之申時行無力持續講讀，且神宗既長，復荒於酒色，罷朝廢政幾二十餘年，更遑論賡續講讀。自萬曆十六年(一五五八)起，至四十八年(一六二〇)帝崩為止，終不見講筵之舉。本節論述所據，全為萬曆起居注(註 36)，除另有所引外，即不再加注。

註 35 《明世宗實訓》，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影印，卷三，頁 42-44，嘉靖六年六月丙午條。《世宗實錄》，卷一，嘉靖六年五月乙酉條。鄧士龍，《國朝典故》本，頁 634。沈朝陽，《皇明嘉隆兩朝見聞記》，卷三，嘉靖六年五月，台北，台灣學生書局據萬曆原刊本影印，民國 58 年，頁 214。

註 36 《萬曆起居注》，不分卷，全九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影印，1988。所有引述具見各日期條下。

先是，穆宗新崩，神宗甫繼，輔臣張居正以山陵未畢，歲事將終，而講筵不可久廢，故請先御日講，次開經筵(註 37)。元年(一五七三)正月初七，帝御文華殿肇行日講。初十，居正以經筵、日講皆所以「仰成聖德，講明治道」，上章題請禮部新擬之經筵儀注，擇於二月初二己時開講。儀注仍前繁複，亦有經筵各官如下：

知經筵官：太師兼太子太師成國公朱希忠
 少師監太子太師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張居正
 同知經筵官：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呂調陽
 講官：吏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陶大臨
 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王希烈
 禮部右侍郎管國子監事汪鏜
 太常寺卿兼翰林院侍讀學士掌院事丁士美
 左春坊左諭德兼翰林院侍讀申時行
 右春坊右諭德兼翰林院侍讀王錫爵
 翰林院修撰陳經邦、何洛文
 編修沈鯉、許國、沈淵
 檢討陳思育

另有展書、寫講章、起止、侍衛、侍班、侍儀、執事各官。其中陶大臨、丁士美、陳經邦、何洛文、沈鯉、許國仍侍帝日講。

至二月初二初御經筵，講官進講大學及尚書堯典。講畢傳賜各官酒飯，並賞綵幣、鈔銀、緞絹各若干。

居正為神宗訂定日講課程用心極深。元年正月十二日疏言大學為聖賢修己治人要道，尚書舜典為千聖相傳治天下之大經大法，就中尤以舜典最為切要。原本每日進講、三日一溫。為免講官書旨過長，致勞帝

註 37 見張居正，「乞崇聖學以隆聖治疏」，載張舜徽主編，《張居正集》，武漢，荊楚書社，1987，冊一，奏疏，頁 70；另頁 73，請酌定朝講日期疏。

躬，故定以後中庸、論語及大禹謨諸篇，於溫講時將內容較長者析為數條，並不拘定三日，惟「有關於治道君德者，句解之後，再加進講。若無甚關係者，則不溫可也」。二年(一五七四)正月初四，居正又以每日講書不過四、五句，而「今聖學日進，睿質日開，前項經書，似宜稍加增益」，因請爾後每日經書起止，較前量增數句；而誦讀生書止於五遍，溫書照舊三遍。又如九年(一五八一)十二月二十日，居正以該年論語講完，明春該講孟子；另通鑑講至宋徽宗，雖未全完，然此下皆徽欽北狩，宋室南遷之事，以為「無可以進講者」，請比照穆宗隆慶五年(一五七一)例，於通鑑講至宋徽宗而止，其後即以貞觀政要接講，居正疏云：

臣等看得貞觀政要一書，乃唐太宗開創鴻業，身致太平之君，於君德治道實為切要。擬於明春即以此書進講。

張居正為神宗所訂日課甚是詳細，為起居注中所不見，見於居正奏疏及孫承澤《春明夢餘錄》，茲引於此(註 38)：

- 一、伏睹皇上在東宮講讀，大學至傳之五章，尚書至堯典之終篇。今各於每日接續講讀，先讀大學十遍，次讀尚書十遍。講官各隨即進，講畢各退。
- 一、講讀畢，皇上進暖閣少憩。司禮監將各衙門章奏進上御覽。臣等退在西廂房伺候，皇上若有所諮問，乞即召臣等至御前將本中事情一一明白敷奏。庶皇上審明日開，國家政務久之自然熟練。
- 一、覽本後，臣等率領正字官恭侍皇上進字畢，若皇上欲再進暖閣少憩，臣等仍退至西廂房伺候。若皇上不進暖閣，臣等即率講官再進午講。

註 38 張舜徽主編，《張居正集》，冊一，奏疏，頁 74，擬日講儀注疏。孫承澤，《春明夢餘錄》，卷九，頁 22-23。

一、近午初時進講通鑑節要，講官務將前代興亡事實直解明白。講畢各退，皇上還宮。

一、每日各官講讀畢，或聖心於書義有疑，乞即下問，臣等再用俗說講解，務求明白。

一、每月三、六、九視朝之日，暫免講讀。仍望皇上於宮中有暇，將講讀過經書從容溫習，或看字體法帖，隨意寫字一幅，不拘多寡，工夫不致間斷。

一、每日定以日出時，請皇上早膳畢出御講讀，午膳畢還宮。

一、查得先朝事例，非遇大寒大暑不輟講讀。本日若遇風雨，傳旨暫免。

又據起居注，元年五月初二，張居正復請依故事經筵惟春秋二季開講，寒暑暫免；但次次題請，未免煩瑣，請敕下禮部著為定例。帝允從之，諭禮部經筵遇寒暑暫免，日講則仍照常行，定經筵春講起二月十二日至五月初二免，秋講起八月十二日至十月初二免，「永為定例，不必一一題請」。

居正輔政時期，至萬曆十年止，督責神宗講讀甚勤，時人以萬曆前十年之治，歸於聖學之不輟，如沈德符記神宗之日常講讀作息：

上每日於日初出時駕幸文華，聽儒臣講讀經書，少憩片時，復御講筵，再讀史書，至午膳而後還大內。惟每月三六九常朝之日始暫免。此外即隆冬盛暑無間焉。此故十年之中，聖學日新，坐致太平之治。（註 39）

神宗講讀典籍甚多，除前文所具，仍包括前朝諸帝所讀之書，而起居注中另有張居正親講之帝鑑圖說。居正每講必反覆詳解，剴切惕勵。其用心當然是欲以古代君王為鑒戒楷模，使帝有所感悟學習，早成令

註 39 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卷二，列朝，沖聖日講，台北，新興書局筆記小說大觀排印本，頁 64。

主。居正於進帝鑑圖說疏(註 40)中，首引伊尹告君之言「德惟治，否德亂。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次引唐太宗自語「以銅為鑑，可正衣冠，以古為鑑，可見興替」，向神宗指陳前史所載治亂興亡之跡，如出一轍：

大抵皆以敬天法祖，聽言納諫，節用愛人，親賢臣，遠小人，憂勤惕厲即治；不畏天地，不法祖宗，拒諫遂非，侈用虐民，親小人，遠賢臣，般樂怠傲即亂。出於治，則雖不階尺土一民之力，而其興也勃焉。出於亂，則雖藉祖宗累世之資，當國家熙隆之運，而其亡也忽焉。

乃將堯、舜以來，有天下之君，撮其善可為法者八十一事，惡可為戒者三十六事，每一事前，各繪為一圖，後錄傳記本文，再其後則為直解。希望以此圖說向帝闡述為君之道與治亂之原，實可窺居正導帝向上用心之深且正也。就此圖說，居正自述對神宗之期望，尤令人感佩：

今臣等所輯，則媿惡並陳，勸懲斯顯。譬之薰蕕異器，而臭味頓殊；冰鏡澄空，而妍媸自別。且欲觸目生感，故假像於丹青；但取明白易知，故不嫌於俚俗。雖條目僅止百餘，而上下數千年理亂之原，庶幾略備矣。

萬曆十年(一五八二)張居正卒，張四維、申時行繼首輔之任，持續導帝講讀。惟二人隨世浮沉，不似居正之嚴切督責。而神宗亦已長成，乃漸露疲態，不時托詞稱病動火，延擱講期或傳免講筵，廷臣連疏請保聖躬、勤御講筵亦不之顧。終於萬曆十六年(一五八八)閏六月初二大學士申時行題疏：

頃以聖體靜攝，天氣炎蒸，每及講期，多從傳免。臣等……以保養聖躬為重，不敢煩勞起居；又以緝熙聖學為先，不欲因循歲

註 40 張舜徽主編，《張居正集》，冊一，奏疏，頁 103-104，「進帝鑑圖說疏」。

月……擬令講讀諸臣將逐日講章照常撰寫，雖遇免講，仍進講章，皇上特賜覽觀，就便溫習。俟金秋涼爽，玉體康寧，時御講筵，接續進講，庶聖學無暴寒之間，而諸臣亦得效其啟沃之忠。

疏入，神宗劄諭：

自古帝王非講學窮理，則修齊治國之要，何由知之？迨朕自入今春以來，心肝二經之火屢屢發動，甚至頭眩不能強起，目黑視物不真，心雖勉而不能，非朕安逸廢於講習。既卿等所奏，講章著不論朝講日期，日日寫來進，以備朝夕溫覽，待於秋涼，朕疾少愈，仍赴講筵，講章還從接續而講。

一是揣摩逢迎，一是順水推舟，君臣二人搭檔唱和，直是一派熱鬧景象。自此，神宗講筵極少，漸至永絕。現就《萬曆起居注》所見紀錄統計製表，以見神宗講筵一斑。

	講 讀	經 筵	傳 免
元 年	87	11	3
二 年	103	12	2
三 年	90	12	1
四 年	8		
五 年	11	1	
六 年	11	1	1
七 年	6		
八 年	54	9	2
九 年	47	11	2
十 年	27	5	1
十一年	7	4	
十二年	7	2	
十四年	5	5	
十五年	2		2
十六年	1	3	2
十七年	1		

說明：表中數字為次數。由於傳本缺漏，故《萬曆起居注》所載講讀情形，並非各年皆全。惟元年至三年，八年至十年則應為最確實者，以其詳載無缺故也。各年無傳本之月份如下：四年缺正至三月；五年缺二、八月；六年缺正月；十年缺正至三月；十一年缺正、二月；十三年全缺；十五年缺四至十二月。另即使有傳本之月份仍不一定每日皆全，以故無法完全計數。唯以現存惟一明代起居注而言，得此資料亦為難能。神宗最後一次講讀在萬曆十七年(一五八九)二月，此後即不見講讀紀錄。

陸、結論

觀現傳之明永樂刊本歷代名臣奏議(註 41)，首揭君德五卷，其次即為聖學四卷。「聖學」所載起自春秋魯哀公問子夏學而後可以安國保民，止於元順帝時蘇天爵奏帝王之治典學為先(註 42)。皆為歷代有關帝王治學講道之臣僚奏議，亦可知明臣之重視帝王講讀，實其來有自。

歷代名臣論君主之學，一以論古聖先王之立德化民，以禮為治；一以講吉凶治亂，得失存亡之所由兆。宋代治平間起居注韓維所論饒富興味，其言曰：

蓋治天下者，必先於建事，欲建事者，莫重於師古；欲師古者，莫急於求多聞。然則今之所講筵者，陛下之所以求多聞也。(註 43)

註 41 黃淮、楊士奇等編，《歷代名臣奏議》，全三百五十卷，台北，台灣學生書局據永樂內府刊本影印，民國 53 年初版，民國 74 年再版。

註 42 同 41，分見卷五，頁 1；卷九，頁 42。

註 43 同 41，卷六，頁 12。

此語已涵蓋帝王講學之全部涵義：治國平天下，凡百經法，只往勤學一路去尋，不須另闢蹊徑。此為傳統儒家政治理想之表徵，治國理民固須政術，更貴在用心。惟有真得古聖賢王之理念真髓，方是用心所在。中國政治以人治為基幹，人君不學即無以養德，無德即易荒道廢政，蒼生遭殃。明臣之亟請諸帝勤講學、明治道，用意無不在此。即使每日只讀寥寥數句書文，日積月累，亦可望有成。孝宗弘治時，曹鼐疏言「講學一日，則有一日之益；廢學一日，則有一日之損」。(註 44)武宗正德時，免朝過多，奏事漸晚，遊戲漸廣，經筵日講直命停止；輔臣劉健上言「臣等愚昧，不知陛下宮中復有何事急於此者」。(註 45)哀哀之請，亦亟之甚矣。

明臣於經筵講讀，常與天做聯繫申解。英宗正統八年(一四四三)劉球上言請勤御經筵，講求至道，「務使學問功至，理欲判然，聖心正而天心自順」。(註 46)此即君王為天之子，以天之名行治於世，若不自修省，則天意不憚，無以報天之德，喪亂恐近在眼前。孝宗弘治元年(一四八八)馬文升疏言帝王之德，莫先於勤。勤則裁決萬幾，無少壅滯。而上天之道，惟在於健。健則萬物生發，無或差忒。是以上天之天道與人君之聖德，實為兩相吻合之體。文升勸孝宗以「膺上天之眷命，紹祖宗之鴻圖」，惟有清心講學，篤志求道，游藝養心，方是祈天永命之道。雖古帝王亦不過如此(註 47)。

人君治國理事，當然希冀天下承平，海內晏安。而君德之養成，則成為治亂興衰之指標。武宗正德九年(一五一四)張原上時政疏，認為人君之學實即德學。其反覆申說德學之理，以為人君之德關乎天下治忽之機；古之明王未嘗不以修德為急。而賢臣之輔勸，亦未嘗不以修德為先

註 44 曹鼐，「請復經筵疏」，《皇明疏鈔》，卷八，頁 714。

註 45 《明史》，卷一八一，列傳六九，劉健，頁 4815。

註 46 劉球，「敷陳十事疏」，《明臣奏議》，卷二，頁 27。

註 47 馬文升，「請勤政事疏」，《明臣奏議》，卷五，頁 91。

務。其理：世無常治，亦無常亂。「德日新者有以致萬邦之懷，儀不忒者足以致四國之正」，其感應之機，實爽然不可誣。然其德是否修備，端視其學之如何耳。張原舉殷高宗、周成王為例，說明：

明君以務學為急，知務學而德之不純者有矣，未有不知學而能修其德者也。知修德而治之不純者有矣，未有不修德而能善其治者也。務學而不能純其德者，抑務之未得其要也。修德而不能善其治者，抑修之未得其要也。且人君之學，豈若經生曲士之為哉。撮大旨，繹大義，審治亂安危之機，探得失是非之源，如斯而已耳。(註 48)

講筵定制之前，諸帝講讀可謂頗勤。太祖、成祖讀書，其實際乃應定鼎天下所需，所讀之書亦自選自讀。如太祖於洪武元年(一三六八)八月，令日寫唐律二十條以進，取進止擇其可者從之。二年(一三六九)三月與詞臣論為學之道。四年(一三七一)與侍臣論孫子，此是為武之書。十八年(一三八五)五月，講心箴。二十年(一三八七)二月，又手註尚書洪範，自為惕勵云：

朕觀洪範一篇，帝王為治之道也。所以敘彝倫，立皇極，保萬民，敘四時，成百穀。本於天道而驗於人事。箕子為武王陳之，武王猶自謙曰，五帝之道，我未能焉。朕每為惕然，遂疏其旨，為朝夕省覽。(註 49)

成祖亦自有造詣。如永樂四年(一四〇六)三月，御彝倫堂，祭酒胡儼講尚書堯典，司業張智講易泰卦，帝諭「六經，聖人之道，昭揭日星，垂憲萬世，朕與卿等皆勉之」。(註 50)復與胡廣等論易：「蓋易，道

註 48 張原，「時政疏」，《明臣奏議》，卷一三，頁 237-238。

註 49 以上太祖各事，分見《明實錄》，太祖，各日期條下。

註 50 《明實錄》，太宗，卷五二，頁 2，永樂四年三月辛卯。

在變通，不失其正，古人隨時從道之說最得要領，唯在虛心以玩之耳」，並云「為學不可不知易，只內君子外小人一語，人君用之，功效不小」。(註 51)二帝讀書均帶功利性質，但總算不廢講讀。

定制後諸帝講讀，勤惰不一。以嚴格體制而言，偶有孝宗尚稱好學，卻不能使其子武宗靜心講讀，立志問學。除神宗前期之外，前此諸帝大約均是有制無體。萬曆十年以後，「雖日講進稿不廢，要之皆成故事故紙矣」。(註 52)熹宗、思宗二朝，則內憂外擾，交逼而來，即欲認真講讀，亦時不我予。

景帝景泰元年(一四五〇)四月，御史許仕達上言災沴迭見，請痛自修省，經筵日講勿徒應儀節故事。侍講劉定之亦疏言十事，其末云：

今天下雖遭大創，尚如金甌之未缺。誠能本聖學以見之政治，臣見國勢可強，讎恥可雪，兄弟之恩可全，祖宗之制可復，亦何憚而不為此。

直將經筵講讀視為復仇雪恥，重振聲威之張本。景泰四年(一四五三)正月，以災傷疊見，方春盛寒，言官王竑上言諸敕責諸臣，痛自修省，省刑薄斂，罷無益之工，嚴無功之賞，散財以收民心，愛民以植邦本，「近親儒臣，講道論德，進君子，退小人，以回天意」。(註 53)景帝之輕蔑講官，則有一事可證：相傳景泰初開經筵，每講畢，輒命中官布金錢於地，令講官拾取以為恩典。時講官高穀年六十餘，不便俯仰，無所得，有同僚某嘗拾以遺。而景帝尚在邸邸時，即嘗懷金錢至史館，撒之於地，令諸臣拾取。似此輕佻之舉，直使斯文掃地。當時便有論者云

註 51 徐學聚，《國朝典彙》，卷二五，頁 5，永樂四年。

註 52 朱國禎，《湧幢小品》，卷二，頁 1，講讀，台北，新興書局筆記小說大觀本。

註 53 以上景泰事，分見《明史》，卷一六四，列傳五二，許仕達，頁 4455。卷一七列傳六四，劉定之，頁 4695。卷一七七，列傳六五，王竑，頁 4707。

「金錢之事，其來已久，不知當時諸公曾講到君使臣以禮一章否」？
(註 54)

憲宗成化九年(一四七三)翰林編修謝鐸因校勘通鑑綱目，上言：

綱目一書，帝王龜鑑。陛下命重加考定，必將進講經筵，為致治資也。今天下有太平之形，無太平之實，因仍積習，廢實循名。曰振綱紀，而小人無畏忌；曰勵風俗，而縉紳棄廉恥。飭官司，而汙暴益甚；恤軍民，而罷敝益極。減省有制，而興作每疲於奔命；蠲免有詔，而徵斂每困於追呼。考察非不舉，而倖門日開；簡練非不行，而私撓日眾。賞竭府庫之財，而有功者不勸；罰窮讞覆之案，而有罪者不懲。以至修省祈禱之命屢頒，水旱災傷之來不絕。禁垣被震，城門示災，不思竦動旋轉，以大答天人之望，是則誠可憂也。願陛下以古證今，兢兢業業，然後可長治久安，而載籍不為無用矣。(註 55)

此疏對當時荒弛情景直刺無隱，而帝不能從。至神宗萬曆十六年以後講筵不舉，有御史錢一本對身為皇帝師保之三公提出糾彈：

三公職在論道。師、道之教訓。今講幄經年不御，是何師也？傳，傳之德義。今外帑匱乏，私藏充盈，不能一為救正，是何傳也？保，保其身體。今聖躬常年靜攝，尚以多疾為辭，是何保

註 54 宋端儀，《立齋閒錄》，卷四。鄧士龍，《國朝典故》本，頁 1015。明代御前八局中，有「銀作局」，專司金銀豆葉及金銀錢之鑄造，輕重不等，累朝以供宮娃及內侍賞賜。據沈德符記載神宗沖年時，即「每將錢豆亂撒於地，任此輩拾取，觀其傾跌攘奪，以為笑樂」；又記賜詞臣金錢，命從地上拾取之事，在宣宗時即已有之。見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卷一，列朝，賜講官金錢，台北，新興書局筆記小說大觀排印本，頁 20。

註 55 《明史》，卷一六三，列傳五一，謝鐸；頁 4431。

也？(註 56)

直將神宗之輟講，視為三公之絕大責任。

經筵日講之制，於明代得為定制，本為頗值得讚賞之事。然以其未能真正落實，而使之徒具形式。廷臣每每連章疏請哀懇，仍不能使皇帝回心轉意；即嚴詞譏刺，亦無效用。傳統儒家政治理想本可藉講筵之制得到進一步發揮，然因人主之有心漠視，終成幻影。正統定制後諸帝，早已無開國初之恢宏氣度；尤其明初太祖、成祖之講讀，其功利氣息濃厚，雖云有心求治而學與有志於學而學均可成學，但終究前者缺乏內在動力。一旦天下太平，寰宇晏安，自然有龐大之官僚機制足以維繫國政之運行，因而學與不學似已無甚分別。設若將就學視為皇家內在理念之一部，則至少尚有屬內在之外緣動力足堪推動，所餘者僅就學者個人之心緒而已。

儒學文臣與科道察官乃明代推動講筵之二大力量。一以學術文章導帝讀書，一以言路有責督促御講。此輩科考出身之臣，以儒學教育背景身任不同職官，然擁護儒家理想之志則相攜無貳，此即近世儒生官僚特色之一。既肯定經筵於中國傳統政治中之重要性質，則不得不肯定儒生官僚於其中所發生之作用與其貢獻。

註 56 《明史》，卷二三一，列傳一一九，錢一本；頁 6037。